经济学家魏杰建议企业家:三年内,以稳为主不要冒险

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历多轮来往,直至现在,仍未完结。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各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近日,著名经济学家、浙大EMBA《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程师资魏杰教授,在浙大EMBA课堂上,从中美贸易摩擦入手,循序渐进,点出了未来三年中国经济的重点所在。

1、美国为什么要打贸易战?

贸易战是双输,不会有赢家,既然是双输为什么还要打?

魏杰说,美国打贸易战其实另有图谋,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阻止中国在国际上获得金融话语权;第二是阻止中国获得技术话语权;第三是反全球化。

中国这次积极应战,是为了维护全球化方向,推动人类社会第三次全球化。第三次全球化的特征是资本、技术等资源在全球的配置,所以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中国在全球化中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所以中国必须坚持全球化的方向。

新的全球化,要求中国全方位开放:全面开放物质产品市场,强调降低市场准入,降低关税,包括在上海建立永久性的进口贸易博览会,把海南岛建成全岛自由贸易港;开放服务业市场,金融、医疗、教育全方位地开放;开放投资市场,公布外资负面清单,除此之外其他都可以投资。

除了放开巨大的国内市场外,中国几十年发展形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要加大对外投资。在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下,全球配置资源有望实现。

这样,中国将是发达国家的平台,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台,把中国融入世界的中央。

魏杰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中国就意识到不能过度依赖出口,开始转向内需拉动。2017年的GDP中,10%左右是进出口,而其中只有1/3是对美国,因此影响不大,可以承受。

但中美贸易摩擦一定会对外汇产生影响,稳住外汇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

2、中国"强起来"的五大指标

魏杰认为,中国正处于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时代。现代化强国有五个指标:要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要具有金融话语权;要具有技术话语权;要具有开放话语权;祖国统一。

要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就要求改革,必须突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概念,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走向全方位的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中国要成为强国,综合实力要强,这五项改革都要推动。

强国的第二个标准,就是拥有全球金融话语权,对外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对内要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外部风险的金融体制。

作为强国的第三个话语权是有技术话语权。中国强调技术创新,不是一般性技术,而是颠覆性技术和原创性技术,要有这样的技术必须进行前瞻性的系统研究。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将在这方面做最大的推进。

强国的第四个指标,必须要有开放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进行全方位开放,既搭别人便车,也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

强国的第五个指标是祖国统一。

"强起来",这是我们思考许多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考虑,中国下一步很多事就好理解了,企业努力的方向也就明确了。

3、未来三年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

过去较长时期内,大家都认为风险主要在增长方面,所以长期把稳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但是2016年后半年开始,大家越来越意识到,风险存在于金融领域。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了三大攻坚战之首,并且强调"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防范金融风险要坚持四大对策:

第一个对策是抑制资产泡沫。资产价格增长太快会引发金融风险。目前抑制泡沫的重点是房地产泡沫,要依靠两大对策:中短期机制与长效机制相结合,绝不让泡沫被刺破,也不能让泡沫被吹大。中短期机制是严格控制投资性投机性需求,约束开发商行为,长效机制则是通过共有产权、租售同权、调整一线城市空间布局、房地产税开征等。

第二个对策是稳住债务。许多国家的金融风险都是债务引起的。债务分为三种:一是个人债务,目前个人负债率接近GDP总量的60%,因此中央提出要控制个人负债率过速上涨的势头,重点控制个人房贷。二是企业债务,严格控制国有企业的负债率。目前中国企业负债是GDP总量的160%,远远超过国际红色警戒线。其中民营企业总体负债率并不高,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此企业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未来三年国企改革会迎来高潮,目标是坚定不移控制国有企业负债,降低到正常水平。三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率高。地方政府盲目扩大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两项财政债务加起来已突破6万亿,因此中央提出严格控制地方财政债务上涨,叫停PPP项目,严控产业引导基金。

第三个对策是治理金融乱象。第一轮乱象是由两种新技术引起的。互联网技术催生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的本来的作用,一是促进信息对称,二是撮合交易,但后来很多互联网公司自己搞融资、投资,干的是金融的事,但是没有牌照,且不受监管,发生大量乱象。因此从事金融行业必须要有牌照,严格监管。第二种新技术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进入金融后产生了数字货币,产生了ICO公司,都可能会造成乱象。第二轮金融乱象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乱象,第三轮金融乱象则是非理性投资引起的。这些乱象要逐渐清理。

第四个对策是控制好两个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首先,货币政策要从宽松转向中性、稳健,这是目前的基本目标,也是要真正防风险必须坚持的货币政策。建议大家要从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出发思考问题,过去那种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能维系了。

另外一个政策,就是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强调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叫顺周期理论,当经济发展非常顺利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忽视风险,盲目扩张,最后导致杠杆率非常高,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引爆金融风险,所以顺周期必须去杠杆,逆周期才加杠杆。去杠杆这个抉择绝不会动摇。第二个要点是防止市场得"传染病",一个市场出了问题,不传染给别人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一旦传染给别人就会引爆金融风险,防止市场得"传染病"要在市场之间设置"防火墙",打隔断,比较有效办法就是调整房产抵押和土地抵押等政策。比如股票质押,未来股票质押可能会做严格界定,比如最多不能超过60%等等。

从今年开始的这三年是最关键的三年。他建议企业家们,三年内不要冒险,别只想着扩张,财富安全是第一位。

(宗禾)

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重大创新

■ 郑新业

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途径和政策工具有很多,包括财税政策、技术创新、价格机制、建设碳市场、强制设备改造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价格改革,为节约能源资源、促进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是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一项重大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积极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

建立高效的能源经济体系,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宏观经济中长期发展始终面临的重大命题。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能源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治理成本,有利于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纠正能源负外部性,更好地平衡协调"清洁低碳、可靠供应、价格可承受"三方面关系。

一是使能源价格体现环境成本。200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出台了脱硫、脱硝、除尘和超低排放环保电价政策,充分调动了发电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较大力度纠正了能源的负外部性,为实现我国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和大气质量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大部分燃煤机组都已完成环保改造,实现了清洁排放。2013年以来,实施油品质量升级加价政策,积极推动车用汽油、柴油质量标准升级到第四、第五阶段,调动炼油企业技术升级改造积极性,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二是合理反映可再生能源的外部成本。减少燃煤发电,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是能源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出台了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等标杆电价政策,标杆电价高于燃煤发电标杆电价部分,通过在销售电价上征收每千瓦时1.9分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予以补偿。与国外相比,我国征收力度比较适中,有力地支撑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世界第一。目前新能源发展面临的矛盾已经从"有没有"转化为"好不好",需要着力解决补贴强度较高、弃风弃光问题突出等"富裕的烦恼"。下一步,应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去补贴""市场化",以强制配额、绿色证书交易等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

三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系统成本。推动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不可避免将提高能源生产价格。为提高能源价格的可承受性,还必须大力降低能源的系统成本,防止推高能源终端价格。这些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一方面强化对电网、天然气管网等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准确核定成本、科学确定利润、严格进行监管,促进公用网络开放,提高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推进竞争性环节的电价、气价的市场化,合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该降就降、该涨就涨。未来,要建立科学的普遍服务成本补偿机制,进一步缩小能源价格中的交叉补贴,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能源价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稀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污水、雾霾、垃圾等突出环境问题,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障碍。恰当的经济政策应当是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使生产者、消费者为能源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付费"。

多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建立了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收费制度,要求各地按照弥补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则制定并调整收费标准,初步建立了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政策框架。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固体废物等突出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减少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排放,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于环境治理、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用市场化手段调动人们节能减排、治理环境、保护生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方面,要减少对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清理规范各个地方给予高耗能行业的优惠电价,使资源能源价格反映真实供求关系,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另一方面,还要合理确定并及时调整垃圾处理费、污水处理费的收费标准,使其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

这次新出台的《意见》对已有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收费政策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创新。**一是扩大了范围。**针对农村地区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的情况,要求在建制镇、农村地区建立相应的收费及环境处理制度,对长江经济带相关省份、工业园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创新了制度。**将收费标准进一步细化,用收费标准的差异化引导污染物的排放,对分类的垃圾和混合垃圾实行差别化收费,将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调整与污水处理效果挂钩。上述创新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只是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具体由各地结合当地实际予以落实,也反映了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特点,使政策措施更有可操作性。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引导结构调整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改善,更多的是结构变化。全面实现绿色发展,最重要的是改善结构,提高低碳、清洁、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比重,压低高碳、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方式。

我国在一些基本民生商品上实行了交叉补贴政策,具体包含工业与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高电压等级用户与低电压等级用户之间的多种交叉补贴。这些政策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同时,也造成了补贴不精准,甚至高收入群体用得更多反而获得更多补贴的现象。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居民用水、用电、用气阶梯价格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叉补贴现象,应当继续坚持并不断深化。

生产领域同样如此。以水为例,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农业灌溉"大水漫灌"的方式极大浪费了水资源。这些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其目的就是要通过适当提高农业水价,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促进农业灌溉节约用水。更为重要的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并不是单一地提高水价,而是统筹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与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用水管理机制的协同推进,也就是提高水价并不意味着增加用水支出,实际上用价格信号发挥了引导用水结构调整的作用。在用电方面,近年来也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推进了基于能耗的阶梯电价政策,通过对超过一定能耗标准的生产工艺实行较高电价,鼓励企业通过加快节能改造、降低能耗的方法提高企业经济效率。

提高价格可以引导结构调整,降低价格也能引导结构调整。比如,在实施燃煤机组节能环保改造后,大大降低了燃煤机组的排放。为促进北方地区冬季取暖期间"煤改电""煤改气",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价格政策,努力降低农村地区"煤改电""煤改气"运行成本。以煤改电为例,通过综合运用输配电价改革、电力直接交易、完善峰谷电价制度等,我国北方地区冬季取暖夜间用电价格下降到每千瓦时0.35元左右,并且取暖用电价格在居民正常用电之外单独计算,不计入生活用电阶梯。2017年取暖季散煤用量出现明显下降,为北方地区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支持污水处理、海水淡化、港口岸电、电动汽车的发展,这次《意见》规定,在2025年前实行两部制电价的,免收容量电费,从而降低这些行业的用电成本。

价格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与其他政策发生冲突与矛盾。例如,降低电网输配成本与产业结构优化目标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严格市场准入标准,从环保要求和能耗要求等方面严格设定高耗能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其次,应该加强价格机制与碳市场建设的衔接,充分发挥碳市场对高耗能行业发展的约束作用,避免因用能成本降低而推动高耗能行业发展。再如,价格机制创新的同时还应兼顾民生问题,避免能源价格市场化导致居民用能负担过重。只有加强价格机制创新与推动绿色发展的其他机制的协调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总体效应。

(转自《经济日报》)

去杠杆不能抛弃实体经济 不要忘记补制度短板

■ 王广宇

自2013年创办以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秉承着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全球视野和时代责任感,致力于打造专业的民间智库和创新的团队。依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我们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两个论坛依托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下,努力探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发展成为了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民间智库。今年是研究院成立五周年。五年多以来,研究院在基础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前沿重大课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我们推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著作,中国2049等重大课题,产生了很好的反响。2017年,研究院在我国社会智库评选中脱颖而出,获评"中国核心智库"。近日,研究院众多专家历时5年时间完成的重磅巨著《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的中国》正式出版,现场的嘉宾应该都已经拿到了这本书。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将会不断前行,为振兴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也请大家继续给予帮助和关心。

2018年已经走过了一半,从近期已经公布的部分数据来看,支撑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的有利因素正不断增多,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稳中更优"的态势得以保持。经济踏入今年的"下半场",如何出色发挥?高质量发展之路如何行稳致远?在今天的论坛上,我们邀请到的各位经济学家、专家们会进行逐一分析。

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平稳运行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力推进,得益于政府不断创新和改善宏观调控,得益于新动能的快速成长,得益于以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去年感受到的是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今年感受最深的是去杠杆。下面我集中谈一个观点:坚持去杠杆、但不要忘记初心,不要忘记补短板。不要忘记高质量发展要依靠实体经济的初心,不要忘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要特别关注企业部门的融资和筹资困难的现实问题。

从上半年的融资数据来看,社会融资总量下降明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融资渠道被监管封堵,对企业而言新的融资渠道特别是权益融资又没有建立起来,实体经济又被挤到了银行信贷的独木桥,这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似乎背道而驰。去杠杆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增长。促进代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新实体经济不断壮大,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带动引领作用才能增强。这个时代需要新的发展动能,从政府到经济学家、企业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一定要"脱虚入实",让金融可以更好的服务实体。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研究,就是如何要催生出一个新型的实体经济,虚实结合、面向未来、生态可持续、天生全球化的"新实体经济"。去杠杆不是要抛弃真正的实体经济,而是要跟新实体经济部门的真实金融需求,跟直接融资、权益金融这样的金融改革更紧密结合在一起。

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期形势却尤为堪忧。从银行信贷来看,受调控政策和实际形势影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尤其是低信用等级的民营企业融资条件明显收紧,资金周转困难,违约不断。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增速下降到10%以内,2018年6月存款余额增长仅为8.4%,存款增长乏力,加之银行放贷存在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双重挤压导致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更是难上加难。针对当期形势,呼吁应该积极采取多项措施,缓解实体经济融资紧张局面,避免民营经济萎缩对经济造成下行压力。

第一,政策要有定力,信号要明确,规则要清晰。金融稳定和监管部门给出一致意见,市场才有确定的反应,务必避免监管共振和无人值守两种极端情况。7月17日,央行和银保监会同时发声,要求银行加大对贷款和信用债的投放,特别是提到按照1:2给予MLF资金,用以增配以民企为主的低评级信用债;另一个则是从资金的价格方面,要求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带动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另外如资管问题,建议监管层面要尽快出台资管新规实施细则。不能否认,紧信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管趋严,特别是资管新规生效之后,其影响将会逐步显现。目前,由于相关细则并没有出台,很多业务不便开展,对企业信贷融资是雪上加霜。

第二,坚定推动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去杠杆初衷是减少地方债、国企、民企、居民的债务,不是让民营企业成为背锅侠。现实中,民营企业传统的融资渠道紧缩甚至断流,融资能力显著下降,其重要原因在于民营企业违约概率偏高,难以获取资金供给方的信任。主管部门应通过信用增级、外部担保、吸引行业基金投资等方式,主动对接相关地方政府,综合利用内外部数据,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加快构建线上线下综合服务渠道、智能化审批流程、差异化贷后管理等新型服务机制,满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特色化融资服务需求,进一步提升信用水平,疏通融资渠道。

(下转A4)